



情欲、伦理与权力

香港两性问题研究报告

与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联合出版

何式凝

[加]曾家达

• 著 •

- 深入解析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
- 集二十余年追踪研究
- 潘绥铭 潘毅 梁文道 合力荐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情欲、伦理与权力

香港两性问题研究报告

何式凝

[加]曾家达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2-249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欲、伦理与权力：香港两性问题报告 / 何式凝, (加)曾家达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61-0676-1

I. ①情… II. ①何… ②曾… III. ①性问题—研究报告—香港
IV. ①D676.58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526号

English edition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only in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独家授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出版和发行上述作品。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云 王斌 侯苗苗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404千字
定 价 5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感同身受 殊途同归

潘绥铭

一位研究者、一本学术著作，能够让同行与读者感到很亲切，非常不容易。可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却感同身受、情动肺腑。为什么？很简单，何老师与曾老师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如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在自己的研究之中，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一切研究，或者首先发源于对自己的剖析，或者最终归于对自己的再认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能够清晰地领悟到而且在学术研究中呈现出自己价值观的发展与研究进程之间的关系。仅此一点，无论研究的具体结论是什么，首先就在方法论的高度实现了其学术价值。这些，何老师的著作都完美地做到了，不愧为这方面的一个样板。

性研究正在中国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研究者开始投入这一领域。我们这些前人有必要也有义务把自己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传授下去，至少应该为后人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路线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老师的这个著作就具有了更加宝贵的价值。

我与何老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也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因此读她的书不仅倍感亲切，而且完全就是精神享受与心灵生发。我要郑重地感谢何老师与曾老师，并且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分享这种美好的境界。

序二

黄耀明

1982年初认识何式凝，我们同是商业二台“突破时刻”的义工。1988年，我告诉她我是个同性恋者，自此她开始了研究同性恋的课题。三十年的友谊，不但成就了我俩各自的成长，也开启了她在香港大学的性学与同志研究。很高兴能见到这本书在国内面世，与友荣焉。

CONTENTS

目录

序一：感同身受 殊途同归 潘绥铭 / 1

序二 黄耀明 / 1

自序一：我在理论中 何式凝 / 1

自序二：太初有欲，欲创造了世界 曾家达 / 27

引言 / 31

导引 | INTRODUCTION

迷失性欲：精英话语和日常语言中的性与性欲 / 34

身体 | BODY

从女孩的经验重看香港性教育 / 56

从女性性器官的命名到重掌身躯 / 71

身份认同与权力 | IDENTITY

香港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一种社会建构 / 90

不仅仅是一个男同性恋者：香港的政治身份认同的繁衍流变 / 105

靓太不易做：香港“师奶”的故事 / 121

永恒的母亲还是灵活的家庭主妇？——香港的中年已婚华人妇女 / 140

崩溃抑或突围：理解香港女性抑郁症的另一种方式 / 171

还看世代：论香港女人“三十世代”香港新师奶 / 187

关系多元性 | RELATIONSHIPS

把弄光环的法则：从对多元关系的反思重新审视“性的阶序层级” / 192

期望值并不高：香港的性与家庭主妇 / 209

欲望：金钱、快乐与自我 | DESIRE

“私房钱”——香港华人女性的退休计划策略 / 232

香港“师奶”情欲再表述 / 251

师奶的小狗、情欲与理想 / 271

香港师奶的色与欲 / 275

网络自我中心？——香港年轻女性及其个人网站 / 280

附录：访谈选例 / 293

后记一 何式凝 / 327

后记二 何翹楚 / 333

自序一：我在理论中

何式凝

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本关于性与性别话题的中文书，为自己二十几年来所做的研究作个总结。出版中文书的念头在我心中已萦绕多年，却因为缺乏体制上的认同和鼓励，只能一拖再拖。身在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大学与都市中，我不得不以英文进行教学和研究，希望能在西方学术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但是，这些西方的、英文的学术写作规范使我的许多思想和情感都难以被淋漓尽致地表达。时至今日，我仍然看不到这些桎梏有什么明显的改变。逝者如斯，坐言起行，于是我下定决心，特意请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学术长假，来完成自己的这个心愿。

本书收录的是我和曾家达从1995年到2009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若干代表性论文，涵盖了1991年同性恋行为在香港非刑事化的过程、1996年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设立、1997年香港主权变更等历史事件。其中《香港男同性恋身份：一种社会建构》（Male Homosexu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A Social Construction）（Ho, 1995）一文，是我在1990年提交的硕士毕业论文《男同性恋人际关系研究》（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Male Homosexuality）（Ho, 1990）的修改稿，所以本书也体现了从1990年到2010年这二十年里我在性与性别范畴的学术历程。

本书的正文将分为四个部分：（1）身体；（2）身份认同与权力；（3）关系多元性；（4）欲望：金钱、快乐与自我。当然，这些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割裂的。事实上，这四个部分的内容均涵盖和反映了一些纵贯全书的主题：作为香港人，我们如何体验殖民统治？这种体验与统治是如何受肤色、性别、性取向以及阶级影响的？

我们如何超越物质空间与符号空间，从而定位自己？我们如何在这个具有多重偶然性的世界中感受与经历矛盾复杂的人生并整合自己从中体验到的意义？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幸运的是，在我一力奋战的过程中，经常能够在与曾家达教授的对话中得到启发。由于各种原因，在本书简体版中仅能收入四篇我与曾教授合著的文章，这与曾教授为我们之间的学术合作与理论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是不相称的。但此书依然反映与凝练了我们相互扶助、不断交流、共同前行的学术历程。因此，我很荣幸能与曾教授一起成为本书的合著者。

◎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把性作为研究主题

作为我和曾家达对情欲立场的注脚，这本书代表了我们的观点甚至“偏见”。更重要的是，它能反映我们多年来对情欲的想法和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很平常。在个人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中，我不断提醒自己，不需要对背弃过去曾拥护的立场和想法感到恐惧。我们今天是在修正甚至摒弃过往的观点，而今天所信所讲也未必是我们未来定然会坚持的观点。这本书只不过总结了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持续讨论的若干结果；在又一个二十年后，我们的想法、立场和观点，也极有可能会有所改变。

我和曾家达之所以选择了性和性别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是因为下列原因：

第一，性具有颠覆性，它渗透在各种个人经历和社会活动之中，看似无色无味，但一旦显露与爆发出来，就有可能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去超越各种既定的界限。

第二，性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受到的压抑和歧视太多，在这个世界上“被禁止”的部分太多。耐人寻味的是，性给身份、关系、思想等带来的细微裂缝，足以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能与悸动以及人性的坚韧与脆弱。

第三，性和欲望被社会的各种规条、规范、规则刻意隐藏。深入了解和研究人的性选择、性经历、性行为，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窥视欲，而是为了探究性被隐秘化、污名化、禁忌化的过程，从而更好地了解整个社会真实的一面。

性的诸般变化与变迁，恰恰表明了性别（sexuality）与欲望（desire）的多维特质，以及善用各种路径、渠道、形式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我们通过观察个人如何创造出自己的性身份、如何与社会的预期相抗争，就可以发现关于身份认同/存在、反抗、颠覆与改变的各种可能性。

我们如何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个体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又应如何面对个人和社会

赋予我们的挑战？“性”（sex），从来只是一个切入点，但这个切入点，却让我们可以尝试超越界限的可能，重获自由的感觉。在性行为、性身份、性取向、性关系方面的选择，不过是种种人生抉择中的一面。和其他方式的自我表达和自我书写一样，都是认识自己、创造自己和超越自己的途径。我期望的是，通过此书提供的理论资源与实践例证，让读者在人生舞台上能找出适合自己的关系模式和思维模式，为自己扩展更多的空间，更有个性地演绎合乎自己性情的剧本。

◎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从黄耀明到同志研究

一方面，这些文章表现与揭示了我们所经历的种种社会变迁、社会潮流、社会运动与社会进程，反映了殖民性的现实，以及我们对性别与欲望的经验如何受到广泛的、全球的、社会—政治力量的限制与影响。

另一方面，这些论文体现了我自己在生活史、学术生涯以及研究重点方面的变化，这正好说明了：当面对个人的、宏观的、学术的转向时，身为一名华人学者，而她的个人历史在当中所占的位置又如何。

回想自己二十年的经历与经验，我深知要敢于挑战学术世界的习惯，我期望发掘新知识和深化个人思维，我相信只有用开放的心智去反思与重建，才能增进学术发展与个人历程之间的相互理解。二十年间，我不断诘问和反思学术界固有的条条框框，同时不断尝试和采用新思维新理论；我每天都会对个人经历和人际关系作深入的反省。我终于明白，理论建构与个人生活是紧密相连的。由于我们对生活的思想和态度会随着身边的人和事物而改变，所以个人经历不应成为论文中偏见的来源，反而应该是某种有力的论证。

在我过往的学术生涯中，199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我以香港男同性恋者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讲述三名男同性恋者的生活史。以同性恋者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我一位最好的朋友——歌手黄耀明在1988年正式对我透露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引起我对同性恋研究的兴趣。我的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截然不同了。我开始明白，生活的真相远比它展现给我们看的表面复杂得多。许多人无法诚实地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真实生活，因为社会本身不允许他们那样做。那么，这些人又如何去处理自己与家庭、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呢？正因如此，我怀着年轻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同性恋者的人际关系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主题。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当时的男朋友竟是一名同性恋者，而他的伴侣是位欧洲男士。我当时感到非常苦恼：为什么一个男人会爱上另一个男人？一个香港

人又为什么会爱上一个西方人？与此同时，我还发现，当时很多香港的华人男同性恋者都偏爱外国男士，这让我对研究跨种族的同性恋关系产生了兴趣。

在1992—1996年期间，我以男同性恋非刑事化为题材，在英国艾赛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ssex）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身份认同的政治化：香港的男同性恋非刑事化过程与男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出现》（*Politicizing Identity: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Gay Identity in Hong Kong*）（Ho, 1997），从政治和社会等宏观的层面研究男同性恋者以及他们在香港的情境下跨种族的同性恋关系与生活。

当时，港英当局急于在香港回归前，依照《人权法案》完成同性恋非刑事化等一系列政治权利的立法。如果没有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推动，本地社团尤其是基督教团体的强烈反对足以使同性恋非刑事化无法实现。这个例子表明：个人会受到政治压力的负面影响，但也有可能会因为政策的变化而获得解放。

最有趣的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西方人士在香港同性恋社群里的失势状况非常明显。华人同性恋者也开始发现，香港的回归与中国大陆的崛起，使他们发现自己不必继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由此可见，性也是受制于政治的，我们个人的性偏好也是与政治有关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曾受到来自受访者、朋友与学术期刊同行评议者的各种质疑。曾有一名同性恋知名人士在拒绝我的访问时说：“我信不过你这支笔。”他又问：“你有没有进过男更衣室？”这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起初，我感到被这个圈子拒绝和排斥，我想告诉他们一个异性恋的女人也能以她的方法明白和理解同性恋者。后来，我慢慢发现，原来自己的这种态度并不正确——我的身份/性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我的研究。来自外界的这些意见、看法、异议与挑战，有助于我自己去质疑，而不是全盘接受既有的概念与理论。我曾一度认为，他们的不友好源于对一个异性恋女性学者的排斥。如今的我则能感激别人的批评，并且希望通过相互学习来提高自我。我能有今天的成绩，不得不感谢他们。

另一方面，我的同性恋朋友普遍认为，我的博士研究中缺少了对同性恋人士的性的研究。于是，我决定重新访问受访者的性生活和性经历。

我在投稿过程中的经历曾让我感到沮丧，但又对我有所助益。当我向*Sexualities* 学刊投稿时，被编辑质疑为什么没有将本地同性恋的西方伴侣纳为研究的一部分。于是我又对一些本地同性恋者的西方伴侣进行了访谈。在经过了各种努力后，一篇关于跨种族同性恋伴侣关系的肛交行为的论文最终在2000年得以发表。我开始认识到，要让自己的论文在学刊上刊载发表，要经过多么艰辛的努力。我也开始明白，

这种严格的学术要求让任何一名学者——尤其是经验不多的初学者——都不能无视或者逃避各种批评。

另一篇有关香港男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论文作为一个篇章收录于《话语理论与政治分析》(*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Howarth, Norval and Stavrakakis, 2000)中,这本书由我的博士生导师阿雷特·诺瓦尔(Aletta Norval)教授和我在艾赛克斯大学的朋友编辑。我曾向许多学刊提交这篇论文,但均被拒绝发表。我很高兴它最终能成为该书的一个章节。香港大学这个学术界的学术评价体系规定,收入书中的章节并不像刊载于学术期刊上的论文那么有价值。但我依然把这篇论文视为自己曾写过的最为重要的文章之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身份认同的繁衍流变”(proliferation of identity)这一概念,以强调身份是流动不定的、是政治行动。在现代社会中,新的术语与新的身份总是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当有的人称呼自己为同性恋者时,“同志”或其他名目也会被创造出来,以各种差异来区分自己与他人。创立身份的这个过程,既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同路人,又是为了在这些同路人中显示与凸现自己的独特与不同。

在那篇论文中,我还指出,我们不当只将社会运动看作是由某些群体组织的运动形式,因为那些不去投票、不注册为选民、不正式参与任何组织、不在公众论坛发表自己看法的人们,也有可能是政治行动者,这甚至包括了那些明确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各种选择、关系和社会实践去质疑现存的种种社会规范。我希望能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读到我的这篇论文,并帮助他们去理解:身份的创造过程也是一种政治运动,而且政治运动可以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今回首,这两篇论文对我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影响甚大,我特此将它们收录于此书中。

在此之前,我曾经以相同的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男同性恋者的社会建构(Ho,1995),脱胎于我的硕士论文;另一篇则根据我为一名男同性恋者和他母亲提供社工咨询辅导的经历而写成(Ho, 1999)。值得一提的是,那次社工经验以及之后与这对母子的继续交流,让我体会到同性恋人士寻找自我价值观时所面对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香港的母亲是如何挣扎着去接受自己的同性恋儿子,并如何在这些挣扎中重新创造她们的自我。这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发展,尤其是对中年女性的生活开展的研究,亦有莫大帮助。

上述种种,连同随后几年被学刊接受并发表的论文,都反映了香港性观念的发展和改变。虽然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看法有所变化,但事实上既有的性别角色依然存在,家庭与社会依然对那些无法按社会期望的方式与标准去生活的男女施加压力。

可喜的是，在二十年后，同性恋不再属于禁忌，“同性恋”（homosexual）这一术语在香港已逐渐普及，而男女“同志”的身份认同亦日趋明显。但是，存在于同性恋者之间的复杂情感并不能得到舒缓。总的来说，香港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观念依然有改变和发展的空间。我也欣喜地看到，其他身为同性恋的学者或者不是同性恋的学者参与到这些研究中去，让“性少数人群”的声音得以表达。

◎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对酷儿理论的新解读

近年来，西方学界出现了更多研究“酷儿（queer）理论”的学者。对于“酷儿理论”，通常我们只把它等同于西方酷儿领域涵盖的某些理论，通常指伊夫·塞奇威克（Eve Sedgwick）或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学说。事实上，很难对其进行一个历史性的概述。正如伯兰特和沃纳（Berlant & Warner, 1995）所说：“酷儿理论并不专指某一类东西的理论，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目录或谱系来涵盖与其相关的著作。”

“酷儿”一词来自英语的“queer”，本义与“weird”，“odd”等相近，表示“古怪的”、“不寻常的”等意思。这个词曾是对同性恋者及其他性少数人群带有贬损意味的称呼，后来被同性恋人群广泛使用来为自己“正名”及重建身份。酷儿理论就是一种源于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对“酷儿”进行研究。而对我来说，酷儿理论最吸引的地方在于它是“反认同的政治”（anti-identitarian politics）。

人群之间（包括少数人群之间）常常存在的立场和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相互排斥，其实正是对身份认同及其背后相应利益的执著，反映的是一种身份上的不安全感，而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人们用排他的方式来肯定自己。这种排他的身份建立模式通常都带有暴力性，以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

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人群”的一员，不应仅仅牢记个体的与某一个独特的身份代表的某一类“少数人群”（如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等）曾遭受的压迫与伤害，更应牢记作为整体的“少数人群”曾共同遭受的压迫与伤害，并共同对制度作出批判。正是出于这种自省的精神，我不但在理论上更深入地批判“身份”的迷思，甚至还改换了研究对象，拓宽了研究视野，开始将自己的目光从表面上的“小众”（如同性恋人群）转而投向多元性关系、“师奶”中年已婚妇女等看似较为被社会接纳但实际上同样是受到歧视的人群。

酷儿理论在香港的发展，情况其实非常复杂。跟台湾的情形不同，香港还不存在能与台湾对等的、能被命名为“酷儿理论”的架构。在香港，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学术研究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几个学科（如社会工作、社会学、文化研究、性别研

究)的边缘地带,其数量并不足以形成一个专属领域。虽然酷儿的学术理论在香港明显不足,不少非学术性的文章所涉及的议题却超越了已有理论曾探讨的范围。梁学思的文章分析了三个香港作者从1984年到2000年的酷儿写作;重点分析了这些文字档案和其中的酷儿情感表达,并相信它们已能集成为一个表达酷儿情感的文库。这些文章集中表达了酷儿生活的不安和焦虑,这些酷儿情感也为理论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所以关于酷儿的讨论不应被限制在现有学术理论的框架内(Leung, 2007)。梁学思从情感而非身份认同的角度展开了自己的研究,我对此深表欣赏,因为这样恰恰反映了“酷儿”精神的本质:对难于言说的种种“古怪的”、“不寻常的”思想感情的尊重与肯定。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酷儿的手法,将酷儿理论本土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一)目前大多数关注酷儿理论的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非异性恋研究上面,而我们希望通过一种不同的角度来参与到这个学术领域中,即把“正常”的身份、行为与情感“酷儿化”。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正常的‘反常者’”——异性恋的中年女性;我们关注的是“正常的”女性,而非那些明显越界甚至是“离经叛道”的性少数人群,但我们发现这些“正常的”异性恋女性同样通过她们各自有趣的方式在越界和“离经叛道”(Ho, 2011)。

(二)许多酷儿理论学者以文本分析方法来对小说、电影等进行分析与研究。我们认识到文本分析的重要性,但我们对酷儿研究的主要切入点与他们并不相同:我们认为,实证研究对酷儿研究领域也很重要。研究者必须对所有的理论提出质疑,将西方理论用于研究本土人群时,这一点尤为关键;研究者还必须认识到这些西方理论在概括我们的生活经验、欲望和幻想时总会有欠缺与不足。作为有社工背景的研究者,我们意识到在探索性和欲望的相关问题时,单纯运用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总是优先考虑研究对象和他们的实际经验。我们乐观地相信这些工作与酷儿探讨的精神是一致的——致力于质疑刻板印象和模糊各种“性的界限”;我们也希望,本书中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证案例之间的互动,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越界”的可能性

回顾过去的学术著作,我发现自己多年来都提倡与重视种种“越界”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社会对我们各类研究对象的接纳程度有所不同;但深入的研究会发现,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没有谁甘愿成为完全被驯服的个体;每

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采取不同的抵抗策略，尝试挑战社会的既有观念与规范（Ding & Ho, 2008; Ho, 2007a, 2007b; Ho, 2011; Ho, in press; Pei, Ho & Ng, 2007; Wang & Ho, 2007; Wang & Ho, 2007b; Wu, Fore, Wang & Ho, 2007）。事实上，我研究工作中的主要部分就在于对这些策略的研究与分析。

在2001—2002年，我决定在男同性恋这个研究议题之外，以女大学生、抑郁症妇女和“师奶”（中年已婚妇女）群体作为新的研究对象。我希望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研究与自己贴近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女性，尝试接触自己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更好地认识 and 了解自己。除了研究各种“离经叛道”的性，我还开始关注和研究那些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其实内里依然“越界”的对象。作为大学教师，女大学生是我比较容易开展研究的群体（Ho & Tsang, 2002, 2005）；之后，我开始对抑郁症妇女进行研究（Ho, 2001）；后来，曾家达提出要研究师奶这些看起来正常的妇女。

身为单身女人，我对“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也相当感兴趣，所以希望去了解已婚女士的生活。基于我以异性恋女性身份去研究同性恋男性所吸取的经验，我已预备接受新的“身份”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位学者和作者都有各自的立场和价值观，与研究对象在性别、性取向、阶级、教育背景等方面都不会完全相同。我曾认为，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我曾相信，社会科学研究者经常需要以“他者”的角度开展研究，他们从这些与圈内人不同的“身份”出发，有时可能提出不同的观点、发现被忽略的现象。受访者在接受“一无所知的局外人”的访问时，需要更为详尽地向研究者介绍各种背景知识。研究者因此往往能得到更多的资源与材料，这些经历也展现出关于身份认同与存在、反抗、颠覆及改变的各种可能。

遗憾的是，这只是理论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曾备受同性恋人士的质疑，认为我这个局外人无法清楚了解不同群体的心声。“你有没有进过男更衣室？”这句拷问使我感到不安与不忿，但这个问题也一直促使我反思：作为不属于被研究群体的局外人，我的研究会有什么优势？又会有什么欠缺与不足？如今的我，会更加重视探讨这些欠缺与不足。

我选择研究师奶，除了因为她们是香港本地学者较少关注的对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身为已婚女性的师奶表面上被社会认同和接纳，但她们自觉地位低微，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只是一种社会的恭维。人们真的清楚这些女性如何生活吗？真的了解她们希望做些什么吗？她们对社会而言是有益、有用、有建设性的，并非是什么“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反倒忽略了她们。我认为师奶在香港的地位是“被边缘化”的，只不过没有同性恋者的“被边缘化”那么明显而已。

在研究香港师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中年师奶被伴侣遗弃，越来越多的香港男性转而与来自内地的女性交往结合。香港回归后，大陆与香港两地沟通交流机会的增加、通关的便利化、自由行的出现，都使跨境的婚姻、爱情、性关系更有可能发生。这促使我最近又开始转向研究这些香港中年男性与年轻内地女性的跨境关系。

对多性伴侣的男女的研究 (Ho, 2006) 也对我们有所启发：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不应只是关注男同性恋人群，还应关注“正常”群体的“反常”现象或非常态行为。我试图探讨人们如何超越常规的界限，从而突破简单的性群体划分。例如，同性恋的女性分享她们与同性暧昧对象之间的故事，同性恋的男性讲述他们怎样通过选择异性婚姻和承担父亲的角色来得到身份认同。表面上并不“酷儿”的人，其实也很怪异——这个发现，让酷儿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正常的”异性恋人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也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酷”了！

●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回顾自己多年的学术生涯，我重新审视个人经历与我研究对象的关系。我发现，个人经历、政治的影响和我的学术选材（对研究对象与理论视角的选取）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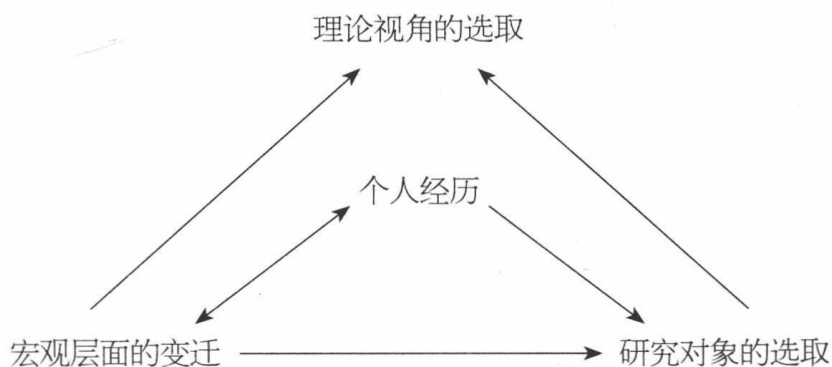


图1

起初，若不是好友黄耀明的“出柜”（宣布自己为同性恋者）以及男友的性取向，我不会踏上研究同性恋者的行列。而同性恋在香港的非刑事化、香港的回归问题所造成的西方同性恋人士的失势，都构成了我学术选材的重要考虑因素。我必须承认，在这样一个拥有特殊的性规范与性政治的社会里，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研究课题与理论视角，是为了探求知识以解决我自身的疑问，是为了找到一种能让自己隐忍求活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二十年间，在研究重点上的转变，显示了男同性恋——各种女性群体——跨境的男性群体这一轮回，真是体现了前述的说法——我的生活史、学术生涯以及研究重点的变化，正好说明了：当面对个人的、宏观的、学术的转向时，身为一名华人学者，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善用知识来解决各种与公众有关的个人议题。这恰恰印证了女性主义者们的说法：“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理论的就是个人的

理论绝不是冷冰冰的、抽离所有个人因素的工具与手段；它源自鲜活真实的生命，有血有肉的生活。一个尊重知识的学者，应该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对某种理论的选择、认同与支持，源自个人的执著与因缘。

为何我当时会深受社会建构理论与后结构主义这些当时被学界中人认为是前卫的理论吸引？因为我觉得，这些理论让我看见了人的思想、心态、行为甚至性取向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我曾希望，当时的男朋友终有一天能由一名同性恋者变为异性恋者。但我渐渐明白，同性恋的身份及其背后反映的社会建构早已在他的个人生活史与性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不过，我依然希望这些理论能够启发与鼓舞我们，让我们有希望与勇气去放开怀抱，重塑自己，让我们找到一种适合彼此的新的关系模式。

我在艾赛克斯大学时，为了能更全面、深入地掌握与探讨这些理论，由社会学系毅然转入政治学系，攻读专门研究如何运用欧陆哲学理论来分析政治现象的哲学博士学位。许多人对此感到惊讶：我曾接受过多年社会工作方面的理论训练与实务历练，为何会选择研究一个被认为与当时的社工领域毫无交集的课题？为何又会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实务性学科义无反顾地转向更为形而上的政治哲学研究？其实，一切都是为了曾爱上一位同性恋者。

不过，这其实也是为了自己。作为女人，我希望能放下执著，找到新的角度与方法去了解自己，释放自己，建立自己新的身份、关系和世界。同时，我和他也希望，我们开拓出的新模式，可以为面对类似境况的男男女女提供一个范例。

二十年间，我在人生路上的兜兜转转，也影响了我在研究理论、对象与方法上的发展：面对感情的、生活的、私人的问题时，身为一名女性学者，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善用知识来解决各种与自己有关的问题。这又恰恰印证了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说法：“理论的，就是个人的！”

而从我个人的变化到社会上的各种变迁，又正好表明了性、性别或情欲的多维特质，因此我们需要善用各种路径、渠道和形式去进行研究。